

单地 原乡

刘玉清

从1970年至今，转眼间已四十多年，我从一个副记者的顽童，成为两鬓略白的中年人。家乡的点点变化刻在我记忆的深处，一事一物、一人一家，都令人怀念。

我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青羊镇北流滩村，是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居住环境清静，邻里相处和谐。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挥洒着汗水。

村宠“绿喇叭”

我家住在村中央，从记事起，家门外就是全村人的饭场子。每到饭点，村东边、村西边的男女老少都会端上粗瓷大碗来到这里，找个石凳边聊边吃。恰巧我家大门门头上装了一个约20厘米、方方正正的墨绿色喇叭，每个饭点，大家听着精神食粮，似乎碗里的饭更有滋味了。因为喇叭声音洪亮，语音清晰，党的政策、科技种植、农村天地、文艺展播、天气预报等信息传递及时，报时准确，深得全村人的喜爱。据村里老人讲，这个绿喇叭是1958年村里安起的第一批喇叭。绿喇叭成了那个年代的特殊历史符号。

吃饭难，吃饱饭更难。1978年前，村里家家生活都比较困难，并没有因父亲在外工作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即使是丰收的秋天，也不能敞开肚皮吃。每年分粮的时候，生产队都是按流程先给村里贡献大的分粮食，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分完后，再按人口平均分。稀不流“有益稠饭”是我家最常见的午餐，早晚有稀汤灌“大肚”就是不错了。

由于衣着单薄，刚入深秋时节，就觉得冷空气来的格外早。又因为受凉，胃里不舒服，常常从嘴里冒出生锈味，酸中带苦。尤其发烧感冒是这个季节的常态，大家伙儿既想看病，又怕拉缸荒，村里家家户户便养成了小病硬扛，大病熬着的习惯。

初冬时节，家家户户为了省煤，将煤和烧土按3：1的比例，搅匀加水调好，堆在家中的煤池备冬。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家里的屋子也不严实，使得调好的煤冻如石铁，水缸里的水也结成冰疙瘩。为了能赶上晚上做饭取暖，比我年长3岁的哥哥放学后总是与几个小伙伴用火柱和锥子替换煤糕。

那个年代，村里没有三轮四轮，更没有农用车，全村的运输仅靠谷玉锁师傅用3头骡子拉的一辆焊接铁车来完成。东家拉煤，西家卖猪，小队拉化肥，大队拉公粮，全是谷师傅一人操劳。谷师傅在村里成了香饽饽，谁家要想拉点东西，就得在半月前下“订单”。我家喂的黑猪出栏时，就是找谷师傅帮忙拉到县食品公司城关收购站卖的。

第一台收音机

我爷爷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82年退休在家，县里给他发了一个蓝色收音机。打从这个收音机进到家门，我就爱不释手，每天总要到老爷子屋里捣鼓一番，才能心满意足地上学、写作业。爷爷着我收音机真心喜爱，就把这台收音机送给我。我珍重地放到自己认为最隐蔽的地方，偶尔有心炫耀，就小心捧着给小伙伴们看。这部收音机，陪我走过整个青葱岁月，经历人生百态，是我成长的见证者。

包产到户头一年，村里的粮食破天荒地实现了大丰收。村民们个个喜气洋洋。还是在那个露天餐厅，还是平常吃饭的那些乡亲，从场院上传出的笑声却一浪高过一浪。大家端着碗，干饭替代了原来的糠汤菜水，黄疙瘩、小米粥成了主流，西红柿、青椒、白菜、土豆等蔬菜成了碗里常客。谁家没吃上，都觉得是一件奇怪的事。逢年过节，白面、大米、饺子等细粮纷纷亮相。张家面白，李家米香，王家肉多，吃得津津有味，谈得开开心心。

那一年的八月十五，也是我家中秋节首次吃肉的日子。

父亲工作地离家较远，一个月回家一两趟，靠的就是两条腿步行几十公里。父亲从来善良、正直，工作所在地一位修车师傅因其人格魅力，把一辆老掉牙的“飞鸽”牌自行车修好，让父亲古董。

父亲工作地离家较远，一个月回家一两趟，靠的就是两条腿步行几十公里。父亲从来善良、正直，工作所在地一位修车师傅因其人格魅力，把一辆老掉牙的“飞鸽”牌自行车修好，让父亲古董。

彩电成了最“牛”嫁妆

1994年我结婚，婚宴十分丰盛。为了招待乡亲好友，鸡鸭鱼肉，杏花村酒、山楂酒，纷纷登场，大锅烩菜面条扑鼻香，全村人出动，都为我们的婚礼送来祝福。

最让人眼球的就是岳父母陪送的嫁妆：贴有大红喜字的18英寸“北京牌”彩电、“海棠牌”洗衣机、“飞鸽牌”自行车、新被褥。加上家里新添的立柜、沙发、写字台、落地式录音机，以及当时流行的席梦思床等，满满的喜字衬托着这个不足30平方米的小屋。红红火火，喜气洋洋，也预示着未来日子的和和美。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小夫妻变成了中年伴侣，家里的电视由岳父母陪送的“北京牌”，换成了25英寸的“TCL王牌”。虽然新家电器不断添置，但陪伴多年的彩电，却一直在那里。女儿多次提议，也该换电视了。我们从最初的不重视，到真正落实到位也有两年多时间。不是经济状况不允许，而是从贫穷路上走过来的我们这一代更懂得如何节俭。电视一点儿都不坏，咋能说换就换呢？也不知是说了换大电视的原因，还是电视机到退休年龄了，这台服务了14年的电视在某天突然颜色失真。随之，一台50英寸的“海尔牌”超薄电视机便理所当然地挤进了大客厅。

时光荏苒，四十多年的时间转瞬即逝。这期间，我见证了老百姓从吃不饱、穿不暖到现在温饱有余、生活逐步小康，从出门靠脚到现在公交直达家门口……这些巨大的变化，无不彰显着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书写感天动地的70年

子，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造出“洋货”一样的生活用品，坐上国产汽车，拥有自己的原子弹、航空母舰，在国际舞台上有自己的地位和发言权……这些梦想，就是期盼过上美好生活，希望国家强大。

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70年实验探索，70年艰苦奋斗。有血，有汗，有痛苦，更有欢乐。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个东方大国，领导英雄的人民，不忘初心，百折不回，找到了一条翻身解放、建设发展、改革开放、繁荣富强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之路。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飞跃，实现了从积贫积弱，到实

现温饱、初步小康的巨变。几代人的种种梦想，变成现实，过去不敢想，也想不到的事情，都发生在中国大地上。

70年春华秋实，70年梦想成真。这是党领导人民奋斗出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1949年共和国成立时，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亲身经历、见证、参与了共和国70年发展历程。为她的每一项成就而欢欣，为她的每一道沟坎而忧心，为她的日益强大而自豪，也为自己是一名奋斗者而感到荣耀。共和国的英雄谱上，写满了一代代开拓奉献者的名字，名垂史册，芳流千古。

走进新时代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

长的发动机，成为这个动荡多变的世界政治稳定的压舱石。当今世界，不管持什么立场、抱何等心态者，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国故事”，是绕不开的话题；“中国奇迹”，是人间奇迹！

70年的奋斗与辉煌，值得我们大书特书。我们要书写人民共和国的由来与发展，道义与担当；中国道路的选择与铺设，价值与启示；奋斗者的忠诚与执着，创造与付出。

书写感天动地的70年，不单看作者的文字功力，更要看作者的政治视野，思想深度，对祖国的感情。必须用心去写，用情去写，用功去写，写出“理含金石之声，文抱风云之润”的巨制鸿篇！

百万雄师过大江



1949年4月20日晚至21日晚，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发起渡江作战。这是江岸炮兵掩护步兵渡江。

新华社发(钱钦摄)

但是，22年前“开诚相见、团结战斗”的一幕，已经不可能重演了。在回忆录中，李宗仁大骂蒋介石和汤恩伯：

“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才，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着‘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属下策，但是我们空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座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胀包的汤恩伯。”

是什么让李宗仁这么伤心？他在辛苦打造长江防线时，汤恩伯却公然把江边的大炮拆走了，根本不把他这个“一把手”放在眼中。英国作家乔纳森·芬比著的《蒋介石传》一书中，很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段：

“当淮海战役的胜利者兵临南京城下，林彪的部队也挥师南下时，一个有关国民党心脏地区防御的重大分歧也随之而产生。李及其团队想利用长江为防御壕沟，坚守南岸。以上海为基地的汤恩伯大军的参与是这一计划成败的关键部分。但是汤恩伯拒绝参与——理由是蒋介石令他固守原地。在李宗仁主持的一个会议上，作战部的首领指出这将削弱阻止解放军过长江的努力。汤则说他不在乎，他已经得到了蒋的命令，而这些命令是必须要执行的。他一边捶着桌子，一边将摆放在他面前的文件扫落在地，并且大声威胁着要杀死那位军政部的首领，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李宗仁的心，确实被伤透了：蒋介石明明已经下野了，却还在遥控！我明明是代总统，却指挥不动汤恩伯！

大战在即，却上演如此荒唐一幕，可见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已经无可救药。乔纳森·芬比在《蒋介石传》一书中，精辟分析了蒋介石的意图：“为了使局势明朗，李宗仁试图让蒋要么重掌政权，要么离开这个国家。但这只是浪费时间——总司令的目的是乘李苦苦支撑之机，在台湾建立其新的权力基础，在这里他既可以重新开始，又不会遇到挑战，尽管目的如此，但他也无意让事情对其继任者变得更容易些。”的确，蒋的利益在于李的倒台——长江的成功防御将意味着当他看到时机成熟时作为国民党领袖而重新出山的野心彻底破灭。”

是的，蒋介石并不希望李宗仁能够守住长江。在他眼里，李宗仁只是为他争取时间和空间的一枚棋子，或曰：炮灰。他执意弃长江而守上海，是因为上海有他的巨大利益，要赶紧再榨取一遍，运往台湾。

汤恩伯守住上海了吗？当然没有，蒋介石让汤恩伯守6个月，但上海战役只打了16天。乔纳森·芬比不无讽刺地写道：在上海，汤恩伯让苦力们挖了很深的壕沟，“并且建了10英尺高的竹制障碍——有消息说他的一位亲戚正是经营木材生意的……”

这样的军队如果还能打胜仗，那真是没有天理了。

三

其实，就算汤恩伯能听李宗仁的命令，拼尽全力守长江，但国民党军队也是守不住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主力已基本被消灭，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的国民党部队，近70万人，看似庞大，但基本上都是覆灭之后重新组建的部队，战斗力弱，而且士气全无。长江北岸，却是挟胜而来、气吞万里如虎的解放军将士。

从今天看来，渡江战役，虽然有江面燃烧、水柱冲天的激战场景，但整体来说，解放军并未遇到特别顽强的抵抗。《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军史》有一节回忆了当时的战斗情形：“夜幕降临，江上刮起了风。中集团三个军上千船只扬帆起航，船工用力摇桨，战士们纷纷用铁锹、钢盔帮助划水，加快船速。先头船刚过中流，距离对岸300米时，敌军开始炮火拦截，有的船被打穿，战士们用棉絮、身体堵漏，有的船工受伤，仍然摇橹不停。我军炮群再次齐射，掩护部队渡江。江心里波涛汹涌，水柱冲天，江南岸是一片火海，映红夜空。各部队陆续到达南岸，平均渡江时间为15-20分钟……”

解放军的江南阵地一旦建立，国民党守军就作鸟兽散了。23日拂晓，陈赓率兵团指挥部乘木船渡江，一帆风顺，很快到达南岸，陈赓在日记中高兴地写道：“晨光熹微，鱼贯入船，微风顺送，疾驰如飞。不一时，舫登彼岸，踏上了江南大地……”

如果不了解背景，还以为这段文字写的是游记呢。

对于解放军来说，渡江战役的目标，不仅仅只是强渡长江，而是迅速穿插包抄，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指挥东集团渡江的粟裕，在部队渡江成功后，连发几道电令，关键词就是一个“快”字：快追、快堵、快截、快歼！解放军将士此刻又使出了极速奔跑的“绝技”，冒雨轻装追敌，到处“包饺子”。陈赓在日记中写道：“大雨如注，部队仍向南挺进。沿途所见，人尽泥饰，走路如扭秧歌。歌声、叫好声、跌跤声混成一片，情绪至为高涨，雨亦不足扫其兴，尤其是沿途敌人弃之武器、车辆、大炮，到处可见，更使部队高兴……”

70年前的一些历史细节，非常动人，比如，江北大军集结之地靖江，人口只有37万，粮食作物总产量仅98000吨。但在渡江战役准备及实施期间，靖江人民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硬是支援粮食300万斤、草料950万斤；随军筑路，立马造桥，许多靖江儿女毫不迟疑地砍掉自家的大树，在短短二十几天时间里，筑公路350多华里，支援驻军的人力达12万余人次。靖江市政协组织编撰《伟大的渡江在靖江》一书中写道：“在奔流不息的江水中，多少人家父子、母女同支前，三代同撑一条船，划起数千只木帆船，冒着敌人的炮火，进军渡大江。”

阎凡路

2019，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从1949到2019，是翻天覆地的70年，是感天动地的70年，是改变中国历史、世界格局、人类命运的70年。

人民共和国从三座大山下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走来，从解放战争胜利的炮火中走来，从广大人民渴望温饱、渴望安定的期盼中走来，从国外敌对势力封锁、包围、制裁的压力下走来，从城乡凋敝、百废待兴的困境中走来……回望来时路，是何等不易！

获得解放的人民，期盼过上吃饱穿暖的日

单地 时空走廊

关山远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众所周知，这是毛泽东在1949年4月下旬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而作的一首诗。整整70年过去了，再读此诗，自信豪迈之气，仍扑面而来。

鲜为人知的是，在渡江战役22年前的1927年8月底，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亦撰有一联来庆祝国民党军人在南京长江边的胜利——龙潭战役，曰“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

龙潭战役，是北伐战争中最激烈、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役，奠定了这一年宣告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基业。同一年，共产党人遭受残酷的大屠杀后，奋起反抗，但起义相继失利，部队被打散，一部转移到湘赣边界的莽莽大山中。

22年，世事沧桑，新旧更替，如这长江滚滚东逝水。

1949年4月22日夜，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新闻稿《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22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当面之敌亦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战犯汤恩伯二十一日到芜湖督战，不起丝毫作用……”

这篇新闻稿的作者，是毛泽东。

长江，见证了这场伟大的渡江战役，是如何击碎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的梦呓，奠定了未来中国格局的。

同样一条长江，也曾经见证了国民党军人的无上自豪：

1927年8月25日拂晓，长江晨雾弥漫，直系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大军大举渡江，主渡点在南京附近的龙潭，孙传芳也亲自过江坐镇指挥，还学项羽破釜沉舟，把船只悉数运回北岸交大刀队看管。他扬言，要彻底消灭北伐军，“我要回南京上海过中秋节”。

此役，孙传芳主力6万余人倾巢而出，志在必得，孙军作战也确实悍勇，一度逼近南京城。而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处于严峻时刻：受武汉汪精卫政权东征讨伐，蒋介石所率的北伐军在徐州遭遇惨败，南京长江以北地区尽被孙传芳、张宗昌占有，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孙军打来，一时大乱，南京城人心惶惶，准备逃难。

但此时留守南京的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人临危不乱，率军抵抗。史载：龙潭周围数十里地，炮火蔽天，血肉模糊，战斗至为惨烈。国民党军队虽挫不退，愈战愈勇，尤其是海军的加入，更使战局向好。战至31日，孙部已被逼入长江边的狭长地带，进入了白刃战。眼看大势已去，孙传芳只能带少数将领，乘小火轮撤到江北，从此一蹶不振。

龙潭一战，孙军除窜逸和伤亡溺毙外，被毙二万余人，被俘者约三万余人，缴得枪支四万余支，炮数十门。史载：俘虏自龙潭押返南京明孝陵时，分四路纵队前进，排头已抵南京城郊，而排尾犹在龙潭……

国民党军队中此后的诸多名将，均参与了龙潭之役，此役更是成就了白崇禧“小诸葛”之美名。

但是到了22年后的1949年，国民党军队再次防守长江时，他们已过了青春热血期，朝气不再，百病缠身，而且，病入膏肓。

二

1949年4月，情形与1927年8月龙潭之役爆发前，似乎颇为相似：蒋介石已在此前的1月底辞职，李宗仁成了代总统，与白崇禧一起守长江，其他防守长江的将领，多数均参与过22年前前的龙潭战役——除了一个人之外，这个人就是汤恩伯，蒋介石的心腹。